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传记篇

凝望与倾听——戏剧理论家陈瘦竹

自 传

● 陈 瘦 竹

我是江苏无锡人，1909年11月29日（清宣统元年十月十七日）生于农村南陈巷贫苦农家。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一岁。我出生后不久丧父，全靠母亲织布、养蚕和做农活维持生计。我从小就过继给守望门寡的婶母，取名定节，意思就是，以我这个继子来安定节妇的心。像一般农村儿童一样，我在幼年就学会割草、放牛、摸鱼和捉鸟，并且喜欢听故事和看滩黄（锡剧）。我们的舅父是顾山镇上的一位小学教师，竭力主张我们上学读书，于是哥哥和我先后进了顾山镇上的锦带高等小学，传说昭明太子曾经到过顾山，临别时以锦带相赠，小学因此得名。1924年我考入在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因为该校不收学膳杂费，只花极少的钱，就可上学。这是一个注重文史、比较守旧的学校，写作要用文言。但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

影响下，我在课外就爱读新文学作品，并且学写短篇小说，第一篇发表在学生会主编的刊物《弘毅》上。当时大家爱用笔名，取本名的偏旁或部首，我就以定节二字的部首 ㄣ 竹作为我的笔名。后因 ㄣ 字比较生僻，而且我哥哥望绅在上海发表小说时署名瘦石，我就改名瘦竹。我的短篇小说《红豆》等，曾在上海《泰东月刊》等杂志上发表。我虽曾在无锡城里读书，但对家乡农村生活还很关心，在寒暑假回家中，见闻尤多。在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的江南农村，不仅民生凋蔽，而且在革命斗争影响下，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启发下，我于 1928 年上半年写中篇小说《灿烂的火花》，描写江南农民的苦难生活和烧毁地主住宅的故事。同年，就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其后即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发行。1929 年春，我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暑假中我借用高班同学陈泰来的文凭，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学名陈泰来，1933 年毕业。在这期间，我曾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武汉文艺》月刊，并在上海《真美善》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大林和小林》等和翻译高尔基的中篇小说《滚石》，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发表论文《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

1933 年 7 月我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不久就和沈蔚德结婚。她笔名维特，常在武汉报刊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并在武昌中华大学外文系肄业。她后于 1935 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学习编剧和表演。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小说创作和翻译工作。直到抗日战争，我写了关于农村经济破产和知识分子不幸生活的小说 15 篇，先后发表在上海的《申报月刊》、《文学》和《东方杂志》上，后来收入短篇集《奈何天》，193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我和哥哥瘦石合译的罗素所著欧洲近百年史《自由与组织》（商务版）外，我还译了希腊塞奥夫拉斯托斯的《人物素描》（载 1933 年南京《文艺月刊》），英国本纳特的《文艺鉴赏论》（载 1934

年《文艺月刊》)。

抗战爆发后，我随国立编译馆到重庆。1938年，我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次年春天，我又随馆迁至江津白沙。这年我写长篇小说《春雷》，描写江南人民反抗日寇和汉奸的斗争，1941年由重庆华中图书公司出版，后又改编成话剧《江南之春》，曾在重庆演出。1940年我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因为我爱人沈蔚德早在那儿教书，我的母亲和孩子们都在江安，从此我就开始了关于戏剧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同时我还继续写小说，印行的有短篇小说集《奇女行》（1942年，重庆商务版）、《水沫集》（华中图书公司版）以及中篇小说《声价》（1944年，国民图书公司版）。我所写的戏剧论文20篇，分别刊载《东方杂志》、《学生杂志》、《文史杂志》、《观察》、《时与潮文艺》、《时事新报》和《大公报》等。我翻译的剧本有雨果的《欧那尼》（1947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和肖伯纳的《康蒂妲》（收入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印《肖伯纳戏剧集》第1集）。我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时，曾任讲师、副教授，并兼理论编剧组主任。1947年，我兼任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4月1日，南京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反动政府接受中共和平条件，不幸遭到血腥镇压。我因前往营救剧专受伤学生，而被卫戍司令部拘留。

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我在该校任教授直到现在，曾兼任中文系主任。1949年7月我出席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0年任南京市文联常委。1953年参加赴朝慰问团，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任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并任江苏省文联常委，1956年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到今。我于1961年4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初期，我想从事专业创作。因此，除参加南京郊区土改运动外，还常到工厂去体验工人生活，积累素材。但是组织不同意我离开教学岗位，我无法长期到工农中去，我对解放前后知识

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虽然熟悉，本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但是这类题材的作品似乎不合当时潮流，所以我终究放弃再写小说的念头。建国 30 年来，除十年浩劫外，我的主要精力用在教学上，其次写了关于文学和戏剧的论文 50 多篇，散见《文汇报》、《人民日报》、《雨花》、《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群众论丛》、《江苏戏曲》、《上海戏剧》、《文艺论丛》、《文史哲》、《文艺报》、《文学评论》、《剧本》和《戏剧论丛》等报刊，这一时期著有（易卜生《玩偶之家》研究）（1958 年，新文艺出版社），《论田汉的话剧创作》（1961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剧作家散论》（1979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其中评论曹禺和老舍剧作的论文系与沈蔚德合作）。我近已选出部分戏剧论文编为一集，书名《悲剧、喜剧及其他》，修改补充完毕后，交出版社印行。今后一段时期，我将与沈蔚德同志合作编写《中国名剧选评》和《外国名剧选评》。

1980 年 8 月
（原载《陈瘦竹纪念集》）

陈瘦竹传略

● 黄 丽 华

著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是 30 年代有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家，40 年代起转而从事戏剧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尤以戏剧美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享誉海内。

—

陈瘦竹，本名定节，1909 年 11 月 29 日（清宣统元年十月十七日）生于江苏无锡港下南陈巷。陈瘦竹曾在《春雷·楔子》中这样描写故乡：

土地平坦，阡陌纵横，村舍相望，鸡犬相闻。忆儿时，黄梅天骑在牛背上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插秧，农人的嘹亮而悠扬的歌声，压倒了杨柳枝头的小鸟和水底的青蛙。大热天坐在豆架棚下纳凉，听那水车声蝉叫。秋收以后，是一年中农人最闲散安乐的一季。有人躲在自家墙脚下，衔着旱烟管晒日黄，看儿女跟着小狗在稻场上打滚；有人抓一把盐蚕豆喝几杯“菊花黄”，醉眼朦胧看夕阳。

陈家是当地闻名的读书人家，所传五亩水田，家境贫苦。父亲务农，也是声望很高的私塾先生。后与顾山镇一位农家姑娘结婚，1908年得长子陈望绅，号瘦石。次年得陈瘦竹。陈家有位守望门寡的媳妇，为安定节妇的心，陈瘦竹自幼过继给这位婶母，故取名定节。在定节还不足一岁父亲猝然离世，一家人的日子更加艰难，全靠母亲织布养蚕和做农活维持生计。与一般农家子弟一样，望绅和定节自幼学会了简单的农活。但定节自有一个情趣盎然的儿童王国，不是听故事、捉鸟、在屋前房后的池塘河沟摸鱼，便是放牛、采菱、割草、种菜或车水，机伶调皮的定节也体会到一个五彩世界，把成年人的艰辛化作儿童的快乐。

父亲去世后，顾山镇外婆家对一家人的照顾和影响最大。舅父在顾山镇当小学教师，竭力劝告姐姐，一定要让儿子上学读书。于是陈望绅和陈定节求读于港下国民小学，后又进了顾山镇锦带高等小学。相传昭明太子到过顾山，临别时以锦带相赠，小学因此得名。定节从小爱听故事，看滩簧（锡剧）。顾山镇每逢秋收以后总请草台班来做戏，定节因此得以接触大戏（京剧）。他与同村的孩子看戏回来，便学做红脸打白脸、新郎新娘的游戏。

由于舅父的坚持和母亲的努力，陈望绅和陈定节1922、1924年先后考入无锡县城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不收学膳杂费，还有些微衣服补贴，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在江苏

很著名，素以文史著称，名师荟萃。陈定节的国文老师是南社诗人吴江沈颖若和钱穆(宾四)。沈颖若教《诗经》、《左传》，钱穆教《论语》、《孟子》。

港下距无锡 70 多里水路，陈定节进县城就学乘坐一种夜间航行的木船。吃过晚饭，他提着行李，夹着席子，走进舱里，在人缝里挤得一席之地，天黑了就躺下来，随着单调的摇橹声、偶尔响起的船夫的歌声，一路摇晃着进入梦乡。翌日清早，航船就摇到了无锡。这种航船几年后被小火轮取代，从此绝迹。在无锡就学期间，陈定节每逢假期回家，还得干些农活，与农村维系着生活和感情的纽带。

家境贫寒的陈定节成为勤奋刻苦、极其珍惜来之不易的就学机会的学生。第三师范讲授经史子集，要求学生背诵经史，写作古典诗文，一方面使陈定节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另一方面却因为远离现实人生，不能满足他求知的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不久，像陈定节这样虽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运动，但已经受到冲击与影响的青年学生，对新文化新文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所以在此期间陈定节最感兴趣的恰巧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新文学。他在课外如饥似渴地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新文学作品。无论是创作的还是翻译的，他都不放过，即便是为此受到伤害也不放弃阅读机会。学校北门附近有一家新书店，除校图书馆，这是陈定节接受新文学的第二个来源。因为没钱买，陈定节常站在那里翻阅，这叫“看白书”。有时不免遭到老板斥责。他在那里接触了许多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品。他当时很不喜欢创造社出版的那些毛边书，因为纸页没有切开，实在无法白看。

陈定节个子不高，但壮实健康，极少生病。但是 1925 年陈定节 17 岁时得过一次病，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因为从那以后陈定节的视力出现减退，假期回家就看不清河对岸来人的脸。

据推测，可能幼年游玩时眼部受过伤，高烧诱发了视网膜黄斑部色素变性。开始，这变化较慢。

20年代还是新文学的草创期，在第三师范这样守旧的学校里更是无法得到有关教育。这时的陈定节还缺乏理论素养，连什么是新文学也不懂，只能凭直觉评定文学思潮与流派，衡量作家作品。在大量的阅读中他获得了最初的审美力。可以说在新文学这门课程中，各种文学社团，各种风格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作品就是他的老师。随着对新文学的深入接触，陈定节跃跃欲试。同学间形成的创作氛围也对他产生影响。当时有些同学爱写新诗，陈望绅写小说，陈定节开始学写短篇小说。那时大家爱用笔名发表作品，多取本名的偏旁或部首。陈定节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学生会主编的刊物《弘毅》上，用的笔名就是定节二字的部首“ㄣ竹”。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题为《红豆》，刊登在上海《泰东月刊》（1927年），署名“ㄣ竹”。

作品得到社会承认给了陈定节莫大的鼓舞。他熟悉农村，尤其是苏南农民的辛苦、痛苦和愤怒。1927年12月无锡农村发生农民暴动。消息传来，一下子激活了陈定节往日的的生活经验。他决定试写一部中篇小说，写出地主对农民不择手段的土地兼并、凶残荒淫的人身占有和受尽苦难的农民的反抗。那时学校的管理不像对新生那样严格，他干脆装病躲到学校专设的疗养室，享受病号的专利，白天可以不上课，晚上又可以不熄灯，日夜埋头写小说。不到三个星期，他竟写了一个十万字的中篇。时间是1928年上半年。

那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上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所发表的激昂的言论使陈定节大为感奋。他因为投稿关系与《泰东月刊》编辑赵梓艺通过信。这年夏天赵梓艺等人发起组织革命文学社团“血潮社”，约陈定节参加。陈定节参加了“血潮社”，并且连夜修改那部中篇小说初稿，题为《灿烂的火花》。小

说同年 10 月由赵梓艺主办的上海励群书店出版，1929 年 6 月再版。因为小说描写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终于愤而烧毁地主光先生的房屋，1931 年被当局列为禁书之一。第三师范时期陈定节另有一些短篇小说发表在《弘毅》上，笔名有“一竹”“石佛”“若苇”等。

1927 年冬南国社在上海举办为期一周的“鱼龙会”演剧，取得极大的成功。在随后的两年中田汉亲率南国社赴杭州、苏州、南京、无锡、广州等地作旅行公演。陈定节第一次观看话剧就是在南国社来无锡公演《南归》等剧之时。

在新文学创作取得最初成功的同时，陈定节所在学校变本加厉地走向了青年学生的对立面。1927 年省立第三师范改名省立无锡师范，由“国家主义派”人士担任校长、训导主任。他们把接受新文学思潮，热衷于新诗、新小说创作的学生视为异端。1929 年春的一天，训导主任公然在课堂上责骂一位写新诗的学生。陈定节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正面驳斥训导主任，引起轩然大波。校方不甘罢休，斥他顶撞师长，扰乱课堂，责令他要么向训导主任赔礼道歉，要么退学。陈定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学，离开无锡师范。尽管他珍惜学习机会，但比这更宝贵的是内心的正直与良知，他不必为一张即将到手的文凭背弃这份精神。

师范没有毕业，生活没有着落。当时很多人负笈东游，鲁迅、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名家都是在东洋沐浴世界文学的洗礼的，陈定节也曾想到过去日本留学。但自费去日本需要一笔旅费，陈定节终因凑不齐这笔旅费而作罢。陈望彬毕业后回乡教小学，陈定节最后只得去找他，暂谋一个代课的空额安身。

二

失学的打击、代课教师的甘苦并没有扑灭陈定节对创作的

热情。他以小说创作作为目标设定未来。鉴于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天然的联系，为了提高创作水准，陈定节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外国文学作品。1929年暑假陈定节投考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秋季进入该系，学名陈泰来。陈泰来原是陈望绅的同学、陈定节的高班同学，当时在常州当小学教师。陈定节借用他的文凭参加考试，故而学名陈泰来。

在武大期间，陈定节潜心学习英语，较少写作。偶有几篇小说发表在《武汉日报》和曾朴主编的《真美善》上。陈望绅在上海发表小说时署名瘦石，陈定节因为‘→竹’的‘→’字过于生僻，就随瘦石改名瘦竹，此后一直沿用。

武大的课程包括闻一多教授的诗歌，陈源教授的英国小说、戏剧和翻译。陈瘦竹为诗歌课所写论文《华兹华斯的诗论》发表在1933年天津《国闻周刊》。陈源当时是文学院院长，陈瘦竹早在无锡就已熟悉他的文章。鲁迅和陈源在《语丝》和《现代评论》打笔墨官司，引起过他的关注和兴趣。当时，他尽管“有时也觉得鲁迅未免‘偏激’，西滢的‘闲话’未始没有道理”；但因惊服鲁迅的冷峻深刻，终究倾向于鲁迅，而对陈源这位英国绅士式的老乡有点隔膜。进校第一学期，陈源教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赛拉斯·曼南》。第一节课陈瘦竹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等待陈源来上课。半个世纪以后，陈瘦竹对陈源师给他的最初印象依然记忆犹新：

他中等身材，穿着半旧的浅灰色派力司长袍，头发浓黑，相貌清瘦白皙，金丝边眼镜后面透出锐利坚定的目光，上嘴唇留着整齐、发亮的短髭，神态沉静文雅，说话比较缓慢，不苟言笑；国语‘并不纯粹，带有无锡音。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难以亲近的老师。他在简单介绍了作者及其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之后，就轮流指定学生站起来读一段原文，然后口译成汉文，凡是学生译错或含糊其辞的时候，他就随时打断，提出各种问题要求回答，实在回答不出，他才予以解释。开始我们都很紧张，有点怕他，上课几周以后，我们才感觉到这位老师学识渊博，态度谨严，经他指点，茅塞顿开。相处较久，我们觉得他并不高傲、冷淡，他的脸上有时出现笑容，倒也和蔼可亲。（《春雷·重版前记》）

陈源的教育方式使学生们得益匪浅。他们的阅读速度普遍加快了，对于英语的理解力、英国文学的欣赏以及翻译能力都有了明显的进步。陈瘦竹因此打破偏见，对他产生了由衷的尊敬。以后他偶尔也到陈源家去，从沙发、茶几上的各种文学刊物深感老师对文学创作的关怀。1930年陈源把沈从文请到武大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也使陈瘦竹感慨陈源之爱才以及重视创作。尽管如此，陈瘦竹发表在《真美善》上的《大林和小林》等短篇小说都不敢拿去给陈源看。因为他总觉得写得不理想，没有信心请教陈源。直到1933年临毕业前，他才大着胆子把短篇小说《巨石》送给陈源看。陈源约他三天以后去文学院院长办公室。三天后，陈瘦竹如约前往，但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陈源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原稿还给他，一言不发。这使他自愧得无地自容，心想：“那一定是写得太糟，使他懒得批评。”他没有勇气请教什么了，接过原稿准备逃走。可就在这时候陈源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开口说：“写得不错，我给你介绍到上海去发表。”这是写给《申报月刊》的推荐信，《巨石》就发表在该刊1933年8月号上。当时《申报月刊》规格很高，一般只发表知名作家的作品，陈源如此赏识和推举陈瘦竹的作品，使陈瘦竹调整了对自己创作能力的认识，对他以后的创作道路颇有影响。

在武大的第一学期，陈瘦竹因为在《武汉日报》发表短篇小说被文学研究会的唐性天发现。当时唐性天从浙江到汉口开设华中图书公司，经营各地出版的图书。1930年初唐性天欲办文艺杂志，约陈瘦竹主编，取名《武汉文艺》。《武汉文艺》月刊陈瘦竹编了前四期。第四期出刊后，王任叔到汉口来，就由他主编。王任叔编了五、六两期后，《武汉文艺》停刊。

《武汉文艺》第一期刊有散文《煤》，作者“维特”。这位“维特”便是日后与陈瘦竹白头偕老的沈蔚德。正是通过《武汉文艺》，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结识了。

沈蔚德辛亥革命那年出生于武汉。父亲早年考入洋务派的晴川学堂，被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炮兵，回国后任北洋政府陆军部军需司司长，有一子五女，沈蔚德是幼女。1922年父亲英年早逝。当时沈蔚德在上海神州女中念小学六年级，因为父亲为官廉洁，并无多少积蓄，她被迫停学两年。后父亲在上海的一位蒋姓朋友供沈蔚德兄妹上学，她才从武汉回神州女中，直到1925年念完中二。国文老师是文学研究会的谢六逸。通过他，沈蔚德接触到苏联、欧美小说和新文学作品，学会观察生活，进行小说与戏剧创作。她的作文《校役彭镒》发表在女中校刊《神州之光》，戏剧创作包括《春常在》和《新烈女传》（又名《民族女杰》）两个多幕剧。哥哥毕业后负担一家人的生计，勉强供她上学。1926年到1927年沈蔚德在武汉男女合校的二中念了一年中学。武汉围城40天后举家躲入乡下。1929年回武汉。沈蔚德同年考入湖北省立二女中高一。二女中较新派，沈蔚德写了许多短小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以“维特”的笔名在《新民报》副刊《空谷》等发表，拿点稿费作零用。“维特”在武汉小有名气，陈瘦竹也了解到了，便托唐性天请她为《武汉文艺》撰稿，两人从此相识。

他们的恋爱虽非一见钟情式，但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兴趣使

这对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成为好友。沈蔚德在二女中参加学生演剧活动，1929 年在《苏州夜话》中饰老画家(男角)。演出时每个演员都有戏票送亲友。他们认识以后每逢新戏上演，陈瘦竹都应邀观看。二女中演剧活动是从田汉的《南归》和《苏州夜话》开始的，1930 年初至 1932 年夏沈蔚德又参加了下列剧目的演出：田汉创作剧《梅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和改编剧《卡门》。二女中演剧活动在武汉文艺界也称得上一件大事，陈瘦竹由此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与谢冰莹就是 1931 年二女中演出《梅雨》那天认识的。沈蔚德曾回忆《梅雨》公演的情形：

我记得那次是借一个什么大会之名，在学校大操场的露天舞台上演出的，因而规模相当大。观众除本校师生及学生家长亲友外，还有不少“来宾”，如外校的学生和武汉文艺界的朋友。(《在明灯的照耀下——谈田汉前期剧作与青年学生》)

在长期的接触与了解中，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陈瘦竹远离家人，只身在武汉就学，所以常去沈蔚德家。在谈话中，他每提及母亲、哥哥，总透露出极其深厚诚挚的感情，对母亲的感情尤深。但两人真正确定关系是在 1932 年夏“落榜”事件之后。

1932 年沈蔚德从二女中毕业，陈瘦竹力劝她念外文。沈蔚德一心想考取学费较低的武大。武大面向全国招生，竞争激烈。外文系招生 20 人左右，报考人数竟达 2000 多。沈蔚德因为数学较差，名落孙山。发榜是在早晨，沈蔚德得知结果，万念俱灰，独自来到武昌码头，坐上到汉口的机动轮渡。轮渡半小时一班，但沈蔚德不想回家，整天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饿了就吃刨冰。随后她又坐轮渡船回武昌，船至江心时她想到有很多人在此投江，自问要不要走极端。沈蔚德最终还是回了家。那时已

天黑，一进门母亲就告诉她：“陈先生早上就来了，整整等了你一天，也出去找过，找遍了都没找到你。”陈瘦竹早晨看到名单就来她家。他劝她不要难过，鼓励她考华中大学外文系，费用高些大家一起来解决。陈瘦竹的理解与关心深深感动了沈蔚德，帮助她熬过了这一关。由此她感慨只有他才是最亲近的人，可以同甘苦共患难。这样他们的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时沈蔚德才肯接受他的资助，考入华中大学外文系。

沈蔚德与陈瘦竹相爱，她哥哥并不赞成，但没能阻止他们的结合。到 1933 年 7 月陈瘦竹从武大毕业，由陈源推荐去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时，他们已难舍难分。这样沈蔚德离开华中大学，随陈瘦竹乘船下江，由南京城北上岸。不久，他们打了两个结婚戒指，写信告诉无锡与武汉的家人，一个小家庭便组织起来了。

陈瘦竹在国立编译馆有一年试用期，工资 100 大洋。他除了接受编译馆定额的翻译任务外，自己仍不倦地翻译文艺作品和论文。编译馆分配给他两间房子。吃过晚饭他就把灯拉下来，饭桌于是成了书桌。这时他已看不清字号小的字典，用的是三五倍的放大镜。即便如此，陈瘦竹在这一年里共翻译了：

人物素描《文艺月刊》1933 年 4 卷 2、5、6 期

文艺鉴赏论《文艺月刊》1934 年 5 卷 1~5 期

始末《文艺月刊》1934 年 6 卷 3 期

康蒂妲 中西书局 1934 年版；《当代文艺》（桂林）

1944 年 1 卷 3~6 期转载；收入《肖伯纳戏剧集》第 1 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婚后的前两年沈蔚德留在家里，1934 年生下一子。1935 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南京成立。沈蔚德在报上看到招生广告，

希望能继续上学。当时演戏仍是件受歧视的事，许多人改名换姓才敢去报考，陈瘦竹开明民主，支持沈蔚德，所以沈蔚德是用本名报考剧专的。国立剧专学制两年，招生条件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证明，第一、二届学生最低学历是高中毕业。沈蔚德1935年进国立剧专话剧科，1937年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编剧”、“戏剧理论”和“表演基本训练”。

1935年凌叔华创办《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周刊，陈源来信约陈瘦竹夫妇为该刊撰稿。陈瘦竹写了《菱》（37期）、《借兵》（70期）和《盐》（94期），沈蔚德以“维特”的笔名写了《母爱与友谊》（47期）和《家》（90期）。《家》后由凌叔华推荐，被选入《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1936年由赵家璧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982年花城出版社重版。

抗战爆发前，陈瘦竹仍以翻译为职业，业余时间创作短篇小说。这使他的时间十分紧张，没有晚上，没有星期天，与外界接触极少，就是剧专的戏也只看名剧，很偶然才陪家人游玄武湖。期间，所译作品有：

导演与演员《文艺月刊》1935、1936年7卷6期、
8卷2期

自由与组织 与陈瘦石合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版

珍·奥斯敦评传 与陈瘦石合译

英国文学史 与张月超、范存忠合译

后两部译著因抗战爆发，原稿散失，未出版

陈瘦竹在战后的逃难途中遗失了为一部长篇小说搜集的农民山歌抄本、新闻记事和其他有关资料。陈瘦竹与家乡保持着联系，他的小说世界仍维系在江南农村。所以当他陆续发表在